

改革开放40周年 我们的父辈

“天塌了，有地接着”

记者 劳育聪

90后 讲述

儿子：徐珂

父亲：徐建迪



今年春节，徐珂与徐建迪的合影。

直至今日，这幢大楼依旧算是处在全慈溪最顶级的地段。现在的孩子，却鲜少有人知道这栋建筑在将近30年前所见证的繁华。那个时候，它叫慈溪供销大厦。爸爸最鲜亮的神情，全部飘零在他供职于此的岁月中。

彼时，30多岁的爸爸，不似许多人，去做改革开放的弄潮儿，而是用最平凡的方式，稳妥地托住这个家，令我与母亲在庇护下衣食无忧。

此刻，我即将30岁，是一名工程师。在试着体会爸爸当年的心态时，我也愈发感激他。在变革的迭代中，想要在逆流涌来时站稳脚跟太不容易。而他的守得云开见月明，终究教会我太多东西。

首次高考，差4分落榜

2004年，我一度荒废学业沉迷于游戏。那一日，正当我为逃离初中校园得意洋洋之际，爸爸气势汹汹地冲进网吧，将我逮了个正着，扬起手掌狠狠地给了一记耳光。我永远都记得，他翕动着嘴唇，迟迟没有说出话来。直到成人后听爸爸讲自己的过去，才知道那一刻的他是有着多锥心泣血。

能不痛心吗？当初的他，只能对着那扇打开却拥挤的高考之门望眼欲穿，而我，却背对着最好的教学环境逃之夭夭。一瞬间，他恨铁不成钢到了极致。

1979年，恰逢改革开放以后的第1年，恢复高考后的第3年。全国对于知识的重视程度大大上升，读书压力陡然间迅速增大。当时，爸爸16岁，在坎西中学读书，铁了心要参加高考。高二开始，竞争突然开始变得异常激烈，快慢班也分了好几次。扑面而来的压力令他乱了阵脚，但爸爸凭借自己的勤奋，一步步考入快班。

今时今日的我，也难以企及他的用功。

爸爸高中那会没有手表，仅有奶奶家那只陈旧的老摆钟。每日天蒙蒙亮，奶奶就会瞅准老摆钟上的时间唤爸爸起床。麻利地用冷水摸一把脸之后，他便捧着书大声背诵，就着晨曦度过最难熬的晨光。

早年的时候，停电是常有的事儿。一旦遇到这种倒霉情况，就不得不在煤油灯下刷题目了。打草稿的纸，从来都不是正儿八经的练习簿。练习簿太贵，薄薄一本就要3分钱。他书写的纸张类似于黄色的牛皮纸，用于包中药，全是跟隔壁熟识的药铺颌首低眉顺回来的。这一来二去的，爸爸便早早开始近视了。1米8大个子的他，发觉瞅着黑板倍感吃力，座位渐渐从最后一排，移到前面去了。

除却每天4公里来回的走读生活以外，爸爸还得在单体的周末干重活。偌大的米仓里，他与小伙伴们用麻线细心地为装满大米的麻袋封口。每袋大米重达180斤，对米袋交织处的缝合要求极高。一天下来，他可以缝完30个麻袋，赚到9角钱交给爸妈，却舍不得顶着一身闷湿的臭汗为自己买一根4分钱的白糖棒冰。

1980年，人生第一次际遇。却不曾想，是一个翘起。高考成绩下发，爸爸还是以4分之差无缘大学校园。咫尺之距，最是伤人。爸爸说：“落榜的难过没在爹娘面前表现出来，眼泪只能硬是往自己肚子里咽。”



徐建迪早年在供销大厦工作的场景。